

中蘇蜜月的最後時刻

——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 莫斯科會議的召開

• 沈志華

1957年11月，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匯聚莫斯科舉行會議，並發表了由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簽署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簽署的《和平宣言》。在國際共運史上，這是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誕生以來，全世界共產黨人召開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甚至是空前絕後的一次盛會^①。但令人遺憾的是，對這一歷史過程，尤其是這次會議究竟是如何籌備、如何召開，在中國、俄國和以前的各社會主義國家，都缺乏專門的研究^②。

以往，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莫斯科會議得以召開，是由於蘇共的倡議，並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的支持和響應^③。這個印象是錯誤的。最近披露的檔案和回憶史料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召開各國共產黨協商會議，以及在會議上發表一個共同宣言的主張，都是中共提出來的。

如果說在波匈事件期間，中共還只是協助蘇共處理東歐問題，那麼在莫斯科會議上，中共已經與蘇共平起平坐，並列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1957年底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達到了頂峰，這次會議無疑就是中蘇兩黨緊密配合的經典之作^④。但是，筆者還注意到，莫斯科會議過後不久，中蘇同盟便出現了裂痕，並很快發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爭論和分歧的，恰恰是對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蘇共首先指責對方的，也恰恰是對莫斯科會議路線的背叛^⑤。這就是說，莫斯科會議成為中蘇關係發展的歷史轉折點。為甚麼會是這樣？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對這次會議得以召開的過程進行深入的分析。

最近披露的檔案和回憶史料表明，召開各國共產黨協商會議，以及在會議上發表一個共同宣言的主張，是中共提出來的。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中共已經與蘇共平起平坐，並列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而莫斯科會議正是中蘇關係發展的歷史轉折點。

一 毛澤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

蘇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方針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也確實「捅了漏子」，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動蕩和組織混亂^⑥。如何穩定局勢，把社會主義大家庭重新組織起來，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在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表現形式是以1947年成立的、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⑦。後來由於蘇共強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鐵托 (Josip B. Tito)，並直接參與和指揮對東歐各黨的清洗，情報局在社會主義各國名聲極壞。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報局的活動就基本上停止了^⑧。鑒於情報局濃厚的斯大林色彩，在二十大期間，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通過了解散情報局的決定。在討論各國共產黨今後如何開展活動的問題時，米高揚 (Anastas I. Mikoyan) 建議利用一些區域性的情報局組織取代現有的情報局。多數人都贊成建立區域聯合組織，但情報局的名稱不能再用。赫魯曉夫 (Nikita S. Khrushchev) 提出這個機構的名稱可以稱為「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絡委員會」，得到一致擁護。會議委託赫魯曉夫等人與原情報局成員國代表及中國代表會晤，聽取意見^⑨。蘇共在大會期間是否與各國黨商談過這個問題，目前沒有看到任何史料。只有南斯拉夫駐蘇大使米丘諾維奇 (Veljko Mićunović) 回憶說，3月29日赫魯曉夫與他談話，介紹了蘇共中央關於建立區域性共產黨組織的設想：國際形勢本身要求為各國共產黨的合作而建立四個新的地區性組織，歐洲兩個，亞洲一個，美洲一個。赫魯曉夫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組織起來，聯合行動，還說目前歐洲各黨正在協商，米高揚則到亞洲各國去商談。他特別提到要去中國，因為對這件事「中國人有甚麼想法是十分重要的」^⑩。

毛澤東的確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經對情報局一類的機構很感興趣。當1947-1948年中國內戰爆發而中共已經決定與蘇聯結盟時，毛澤東對共產黨情報局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支持，至少在蘇共看來，中共可能有意搞一個「東方共產黨情報局」^⑪。1949年春，緬甸、馬來亞、印度支那共產黨給中共中央寫信，建議成立東方各國共產黨情報局。但毛認為內戰尚未結束，時機還不成熟，沒有答應^⑫。1949年7月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提出了中共參加歐洲情報局的問題。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沒有必要」，但認為東亞各國的情況與中國類似，可以考慮建立「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⑬。後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此事又耽擱下來。到斯大林去世，特別是1955年中國緊隨蘇聯之後，與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時，情報局在歐洲已經無人理睬。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重提建立類似情報局的共產黨組織，顯然不合時宜。因此，蘇共的這個建議被中共輕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揚訪問印度、緬甸後來到北京，他在會談中說，蘇共中央建議各國聯合出版一個刊物，還提到要成立聯絡局。毛澤東明確表態：不贊成辦刊物和設立機構。毛說，過去情報局搞刊物，結果並不好，第三國際和情報局給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現在搞聯絡局，那麼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會害怕。毛澤東的建議是：「有事開會商量」，召集人當然是蘇聯比較好。「你們召集會議我們到，有事開會，無事不開。」^⑭顯然，中共雖然也主張各國共產黨應該協調行動，但認為活動的方式不是建立機構和辦刊物，而是開會解決問題。目前看到的史料沒有顯示蘇共對此做何反應，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當時蘇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亂而面臨窘境，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聯絡局和創辦新刊物的設想都是無法實現的。

1956年3月，蘇共中央建議各國聯合出版一個刊物，還提到要成立聯絡局。毛澤東明確表態：不贊成辦刊物和設立機構。他的建議是：「有事開會商量」，召集人當然是蘇聯比較好。「你們召集會議我們到，有事開會，無事不開。」

二 中共有意與南共聯合召集會議

儘管各國共產黨還沒有商量好如何繼續開展活動，但取消情報局卻是大家的共識。4月13日蘇共向各國共產黨發出了關於停止情報局活動的通報^⑤。4月18日《真理報》(Pravda)發表公報宣布：由於形勢的變化，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無論就其組成成員來說，還是就其活動內容來說，都已經不適應新的條件了。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在1947年成立的情報局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為此，經過相互協商後決定，結束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活動，停止出版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公報還提出，在新的條件下，能夠和應該找出建立各國共產黨之間「聯繫和接觸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報》立即轉載了這條消息^⑥。

情報局是解散了，但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與合作還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給東歐一些黨關於解散情報局的信中，蘇共中央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接觸和聯繫的方式問題，應該在近期舉行的會晤中得到解決^⑦。為此，6月22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開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相互接觸的形式問題^⑧。6月3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蘇共中央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草案》。鑒於此前出現的黨內和社會的思想波動問題，決議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做了許多限制性解釋，同時提出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之間建立聯繫的必要性：「在新的歷史情況下，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這樣的工人階級國際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這絕不是說，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的革命的兄弟政黨的國際團結和接觸的必要性已經失去意義。」恰恰相反，現在「各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團結和兄弟般的團結尤其是必要的」^⑨。這一點不僅蘇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國共產黨也有類似要求。如法共總書記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十四大的報告中表示，情報局停止活動後，各國共產黨會考慮各自國家的民族特點，但必須加強聯繫，以解決「國際工人運動的方向問題和各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問題」^⑩。正在蘇共中央緊鑼密鼓地與各國共產黨協商之時，波匈事件爆發，事情只得拖了下來。

風暴過去以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團結和統一顯得更加必要了。毛澤東和中共對波匈事件非常關注^⑪，在危機處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響，幫助莫斯科化險為夷，從而進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特別是對歐洲事務的發言權^⑫。大概是考慮到莫斯科面臨的尷尬和被動局面，以及蘇共沒有正式答覆是否同意召開共產黨國際會議的主張，在中共看來，此時召集各國共產黨議事，最好由自己出面了。於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幫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善後事宜期間，周恩來便主動再次提出了召開共產黨國家代表會議的問題。不過，這時中共雖然繼續同蘇共「交換了意見」^⑬，但私下考慮的會議召集人卻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貝爾格萊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招待會上，周恩來特意找到米丘諾維奇，向他介紹了中共關於召開共產黨國家代表會議的想法。周首先提出，應當組織一次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代表會議，目的是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聯繫，

毛澤東和中共對波匈事件非常關注，在危機處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響，幫助莫斯科化險為夷，從而進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特別是對歐洲事務的發言權。

消除妨礙合作和團結的因素。會議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舉行。周恩來希望知道，鐵托認為召開這樣一次會議是否有益，以及預定的時間是否合適。周提出，如果鐵托同意召開並參加這次會議，他將對南斯拉夫進行正式訪問。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訪問，已經授權他與鐵托商談。米丘諾維奇提出，為了能更確切地向貝爾格萊德報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細節，比如召開這個會議的倡議是誰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參加，會議是否還會舉行。周恩來毫不猶豫地回答：召開這次會議的倡議是中國提出的。又強調：更確切地說，整件事起源於毛澤東本人。周解釋說，會議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產黨人之間的新組織，會議也不會做出任何強加於與會者的決議。雖然不是很堅決，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參加，會議就不會舉行。不過，那樣就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周恩來還說，會上將研究創辦各國共產黨新的報紙的問題，但中共反對這樣的做法。米丘諾維奇對周恩來如此直率的談話非常意外，並感覺到中共對蘇聯以前的做法持批評態度²⁹。

此前，周恩來確與正在南斯拉夫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通過電話，要求他臨時拜訪鐵托一次，並指定由伍修權大使親自擔任翻譯。於是，在1月29日的單獨會談中，彭真向鐵托轉達了中共的建議，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發起，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討論和協調各國黨的活動的問題。鐵托表示，關於召開各國黨代表會議的問題很重要，南共中央要專門討論。他個人的意見是進行雙邊或者多邊的會談為好，不贊成召開全世界各國黨的會議³⁰。南共的態度令中共進退兩難，因為事前並未向蘇共提到會議召集人的問題，回國途徑莫斯科時，彭真只好含糊地向赫魯曉夫通報說，鐵托原則上同意參加各國共產黨會議³¹。

在莫斯科看來，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最重要的人員，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這兩家的意見已大體一致，蘇共只能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開會解決問題³²。為此，2月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鑒於南共的態度有些勉強，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通報各國共產黨會議的問題時不要表現出強迫態度和過份熱心，可先進行雙邊會晤。會議認為應與中共商議召開會議的時間問題了，並委託蘇斯洛夫 (Mikhail A. Suslov) 和謝皮洛夫 (Dmitri T. Shepilov) 草擬致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團批准的給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蘇共同意中共關於舉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建議，認為應該由中共籌備和出面主持這次會議，並希望把有關籌備情況及時通報給蘇共中央。信中還說，對於蘇共領導人來說，會議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進行比較適宜³³。

莫斯科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會議的建議，着實令中共吃驚。蘇共並不知道中共曾建議由中南兩黨召集會議的情況，而來信卻說：「根據已經獲悉的協議」，應該由中共中央主持會議的籌備工作。對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頗感疑惑，並追問緣由。當事人斷定，可能是周恩來在莫斯科與彭真的通話被監聽了³⁴。面對如此被動的局面，毛澤東一改初衷，答覆蘇共中央說：中共中央不準備籌備和主持這次會議，會議應由蘇共中央籌備召開。中共中央同時認為，會議應該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召開，建議不要匆忙地開會³⁵。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1957年2月7日蘇共給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蘇共同意中共關於舉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建議，認為應該由中共籌備和主持會議，這着實令中共吃驚。

三 赫魯曉夫迫切需要毛澤東的支持

過了四個月，蘇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開會議，並建議在7月就召開一個秘密會議，同時提出，會議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見，不規定議程，由參加者自己來決定會議的性質和程序。這一次不好再推託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開會議，但建議為開好這個會，應事先經過商量，可以先提出一個文件草稿，發給各兄弟黨徵求意見。一致的意見就寫上，不一致的就不寫。考慮到這個文件要公諸於世，中共主張會議之前要在共產黨之間充分交換意見。草案要經過討論、修改，一致同意後再開會。中共認為，這樣做可能時間會長一點，麻煩一些，但是，準備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處的^⑩。然而，就在會議籌備工作開始進行時，蘇共內部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六月事件。這次事件的結果再次使中共佔據了主動地位，赫魯曉夫對毛澤東也更加言聽計從了。

二十大以後，蘇共領導層內部逐步形成了兩個派別集團。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 Molotov)、卡岡諾維奇 (Lazar M. Kaganovich)、伏羅希洛夫 (Kliment Y. Voroshilov)、馬林科夫 (Georgy M. Malenkov) 等人構成了赫魯曉夫的反對派，並在主席團內形成多數。而赫魯曉夫周圍聚集了一批年輕的主席團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他的支持者構成了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到1957年夏天，雙方的矛盾因主席團改選日期臨近而開始激化，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繼續貫徹二十大路線。6月18日，在違背赫魯曉夫意願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大多數成員堅持要求由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 (Nikolay A. Bulganin) 主持會議，而剝奪了本應該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權力。會議對赫魯曉夫提出了大量指責，並以7比4的票數通過了免去赫魯曉夫第一書記職務的決定。面對這預先策劃的突然打擊，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蘇斯洛夫、米高揚等人採取了拖延戰術。赫魯曉夫在第二天繼續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從各方面檢討自己，暗中卻布置國防部長朱可夫 (Georgy K. Zhukov)、克格勃主席謝羅夫 (I. Shelov) 緊急動用軍用運輸機，將一批中央委員運到莫斯科。這些經過專門挑選的約二百名中央委員強烈要求參加主席團會議，並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的改選問題，朱可夫甚至揚言可能會動用武力來迫使主席團就範。面對突變的形勢，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讓步，中央委員會非常全會於6月22日開幕。在持續了八天的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完全掌握了主動權。在十二次全體會議上，有六十人發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書面發言或聲明，一致譴責莫洛托夫等人的「反黨行為」。會議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把他們開除出中央委員會^⑪。

赫魯曉夫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遭遇到來自黨內外的巨大壓力。在蘇共基層討論中央全會決議的過程中，參加者非常踴躍。據統計，僅在俄羅斯聯邦就有84.6%黨員和預備黨員總計371.15萬人參加討論，在會議上發言的有71.35萬人。儘管像一般黨的會議一樣，多數發言者都表態支持中央的決議，但提出疑問者也不在少數。相當一批黨員和群眾在發言中表現出驚慌和懷疑的情緒，他們很難理解所發生的事，很多黨組織都把這看作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不少地方在開會時爭吵激烈，氣氛緊張。有人要求讓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人在廣播或

過了四個月，蘇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開會議，中共中央不好再推託，表示可以召開會議，但建議應事先經過商量，提出一個文件草稿，發給各兄弟黨徵求意見。就在會議籌備工作開始進行時，蘇共內部發生了六月事件，再次使中共佔據了主動地位，赫魯曉夫對毛澤東也更加言聽計從了。

報刊上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有人甚至當場宣布，寧願被關進監獄和開除黨籍，也不同意中央的決議。還有一些單位的討論超出了黨所規定的範圍，很多大學的黨員提出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必修課程的考試，人們還對社會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出強烈不滿，甚至發生了砸汽車和跳樓自殺事件。面對如此混亂的局面，有些州黨委不得不建議讓國家安全委員會出面進行干預^③。

赫魯曉夫的麻煩不只來自國內和黨內，繼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後，蘇聯又發生如此驚天動地的事情，也引起了各國共產黨的猜疑。儘管東歐各黨大都在報紙表態擁護，但據中國使館發回國內的報告，「在波蘭的反應一般是冷淡的」，捷黨「多數表示不理解」，「整個保加利亞人也很難理解」，很多人甚至對赫魯曉夫的做法持批評態度^④。中共基層黨組織的反應更加非常強烈，其討論的熱烈程度絲毫不亞於蘇共黨員。上海市黨內外的普遍反應是：「從蘇共中央決議揭發的事實來看，反黨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屬於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對黨內分歧這樣處理「會給帝國主義利用」，「帝國主義一定會藉這個問題挑撥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甚至中國的右派份子也會「混水摸魚」。天津市委機關幹部聽到消息後，連夜討論，第二天上班後仍然議論紛紛。許多人對蘇共中央這種做法表示懷疑、驚訝和不滿，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進行干預。山東省級機關黨內外幹部的思想波動也很大，普遍懷疑蘇共決議，認為赫魯曉夫「小題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條反教條，以個人崇拜反個人崇拜」。廣州市幹部為蘇共中央決議可能引起的後果而感到焦慮不安，他們認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爾什維克，革命一輩子，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場！二十次黨代會批判斯大林的結果是在東南歐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亂，這次會不會重新引起混亂^⑤？中國駐蘇使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也認為：「反黨集團事件是蘇共中央使用組織手段處理黨內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實質來看是屬於黨內是非之爭，從公布的材料看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論證該事件有反黨的性質。」蘇共對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嚴重的組織處理是值得考慮的」。「這次事件繼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後第三次嚴重地打擊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的威信。」^⑥

赫魯曉夫很清楚，為了鞏固蘇共新領導集團在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舉動需要得到各國黨的支持，其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支持^⑦。中央全會結束後，7月3日，蘇聯立即向各共產黨國家使節介紹了全會的情況，又專門向中國使館進行了個別通報^⑧。同時，蘇聯駐華使館還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緊急約見毛澤東。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臨時代辦阿布拉希莫夫(P. A. Abracimov)時只表態說，毛澤東不在北京，情況可以轉告，又說，對一些老同志犯了錯誤，能否採取別的辦法處理^⑨。7月4日，《真理報》刊登了會議決議和新聞公報，同時刊出的還有一些黨支持蘇共中央全會決議的公開表態^⑩。但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大部分黨沒有表示自己的立場，這引起了蘇聯的注意。在當天的一次宴會上，《真理報》總編輯問中國記者，中國報紙發表了甚麼。當時中國的反應確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大學生的言論很能說明問題，他們說：對於蘇共中央的決議，「毛澤東不發表意見，我們也不發表意見；現在只有毛澤東說的才算對的」^⑪。但此時莫斯科對中共的態度還一無所知，赫魯曉夫顯得非常焦急，於是派米高揚立即飛往中國，直接聽取毛澤東的意見。

赫魯曉夫很清楚，為了鞏固蘇共新領導集團在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他在中央全會的舉動需要得到各國黨的支持，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支持。

其實，中共中央對此事十分重視，7月4日晚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了研究。會議討論的內容，目前不得而知，但有材料說，第二天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傳達了中央的基本方針：從承認事實、分清兩派是非觀點出發，對新的蘇共領導機構，只有支持」^②。7月5日晚，毛澤東在杭州會見米高揚，談了整整八個小時。米高揚詳細介紹了情況後，毛澤東發表了幾點意見：莫洛托夫的錯誤在於思想守舊，企圖破壞黨的領導；蘇共這樣解決問題很好，加強了黨的領導；中共原來有些人認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員會，現在看來只能如此處理；肅反問題主要是取得教訓，不可太追究個人責任，要注意團結。毛澤東最後表示，這次事件對中共也有些震動，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召開會議，決定公開發表意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議^③。

7月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米高揚匯報說，一開始中共反對採取把莫洛托夫等人開除出中央的嚴厲措施，但最後「中國朋友對中央全會的決議感到滿意」，「認為做得非常好」。主席團會議因此一致認為，米高揚對中國的訪問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④。毛澤東的表態如雪中送炭，使赫魯曉夫如釋重負。赫也感到，召開一次共產黨會議，一方面不能再耽擱了，另一方面更需要依賴中共了。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約見劉少奇，轉達了蘇共中央關於盡快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建議。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說：開這樣的會應該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結果，要事先和各兄弟黨商量，搞出一個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來^⑤。中共的答覆給赫魯曉夫吃了定心丸，蘇共開始積極進行準備。在莫斯科看來，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黨的意見似乎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毛澤東就蘇共中央全會決議發表了幾點意見，並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決定公開發表意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議。毛澤東的表態如雪中送炭，使赫魯曉夫如釋重負。同時他也感到，召開一次共產黨會議更需要依賴中共了。

四 中蘇共同籌備莫斯科會議

波匈事件後蘇南關係有些緊張，為了進一步搞清鐵托的態度，蘇共派專人去南斯拉夫商議。8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諾馬廖夫 (A. Ponomarev) 和安德羅波夫 (Yuri V. Andropov) 自貝爾格萊德發來電報說，與卡德爾 (Edvard Kardelj)、蘭科維奇 (A. Rankovic) 等人會談的結果是，南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不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也不接受共同宣言，其理由是擔心南斯拉夫的國際處境因此變得複雜化^⑥。蘇共中央主席團於當天召開會議，決定將已經起草好的宣言草案寄發原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國，其中特別要求駐波蘭大使親自向哥穆爾卡 (Wladyslaw Gomulka) 通報。會議還確定，只要這些黨認為適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絕，也要召開協商會議^⑦。蘇聯很可能此時決定，利用各國黨代表團來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慶典活動的機會，召開協商會議。第二天，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便致函毛澤東，正式邀請他赴蘇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同時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和若干其他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舉行的國際會議。信中還說，為了把這個會議辦好，蘇共將把準備提交會議通過的文件，交給中共中央徵求意見^⑧。對此，毛澤東欣然接受^⑨。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黨透露毛澤東將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來，這是暗示將在

慶典期間召開重要會議，並且希望各黨「也派遣自己的第一號人物來莫斯科」^⑤。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商量的訪蘇代表團的問題^⑥。

10月22日周恩來向蘇聯使館通報了訪蘇代表團的人員組成和動身日期^⑦，但此時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沒有解決，即蘇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得到中共認可。直到10月28日，蘇聯大使尤金 (P. F. Iudin) 送來了赫魯曉夫給毛澤東的私人邀請信及蘇共起草的會議宣言草案。尤金稱，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徵求意見，南共領導人不同意這份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將草案翻譯後，分送有關領導人。胡喬木看後認為需要修改，毛澤東又問鄧小平的意見，鄧也認為必須修改。於是，毛澤東指定胡喬木動手修改，並指示，在文字上盡可能保留蘇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問題還是要表明我們黨的觀點。胡用兩天時間對草案做了較大改動，有的部分幾乎重新寫過。根據中國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粗略統計，中方對草案的修改約一百多處，較大的補充有二十餘處，刪節三十餘處。胡喬木所增加的重要內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長可以阻止戰爭的爆發，而帝國主義戰爭狂人硬要發動戰爭，則必然會在戰爭中自取滅亡；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於工人階級來說，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毛澤東看過修改稿後表示同意，並特別欣賞最後一段表述^⑧。

南共中央決定不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也不接受共同宣言。蘇共中央主席團開會確定，只要其他各國黨認為適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絕，也要召開協商會議。

10月29日晚，毛澤東會見尤金大使。毛澤東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蘇共中央送來的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見。總的來說，草案需要大量刪減，只保留主要的、原則性的內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中共還有一些意見。第一，關於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中共主張要同時提出和平過渡和非和平過渡兩種可能性。第二，關於對社會民主黨的估價，毛澤東認為對這個問題的提法應該更一般性，不應當僅僅突出地提出與右翼社會黨人團結的問題，而是要找這樣一種提法，以便能把社會黨人、資產階級民主力量和進步力量都包括進去。第三，關於反黨集團的問題，毛澤東希望在宣言中不要指名道姓。最後談到莫斯科會議文件的形成問題時，鑒於南斯拉夫，可能還有波蘭，不同意宣言的內容，中共提出三個方案。第一是經過事先充分討論後通過並發表宣言，即使有一、兩個代表團反對，宣言也要通過。毛澤東傾向於這個方案，並說：這樣「天下不會大亂」。第二是經事先討論通過一個簡短的宣言式公報，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問題。第三是只由中共和蘇共兩黨發表聲明。毛澤東請尤金盡快將這些意見轉達給赫魯曉夫，以便蘇共中央主席團了解中共代表團將帶着甚麼問題去莫斯科^⑨。

10月3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宣言草案。鑒於需要商議和修改的地方較多，毛澤東決定提前去莫斯科，到那裏起草一個稿子，提交蘇方討論。政治局會議還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會議關於代表團的方針的決議^⑩。11月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了尤金10月30日電告的毛澤東談話內容。會議做出決議，否定了只搞一個簡短公報的方案，而接受毛澤東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的代表團不簽字，也要發表共同宣言，同時，也可以搞一個中蘇兩黨的聲明。最後，會議要求蘇斯洛夫等人參考中共的意見進行修改，盡快提交主席團^⑪。當天，毛澤東率領一個龐大的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五 起草共同宣言時中蘇的分歧和妥協

莫斯科會議的整個過程，實際上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過《莫斯科宣言》。從11月3日中蘇兩黨開始交換意見，到10日基本達成一致共識，然後又交給各黨代表團討論，並成立起草委員會修改，直到會議的最後一天(19日)完成定稿，進行報告和簽字。在此期間又決定，分別召開兩個會議，執政黨(南斯拉夫不參加)單獨簽署《莫斯科宣言》，全體共產黨、工人黨另外簽署一個《和平宣言》。各種不同意見的交流，不同看法的爭論，苦口婆心進行說服，想方設法達成妥協，所有這一切求同存異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討論宣言的過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澤東所說，重要的問題是與大家商量搞出一個會議文件，「開會實際上只是一個形式而已」^⑥。但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中共代表團頗費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的當天，赫魯曉夫登門拜訪。毛澤東說，我提早到來就是為了宣言草案。我們要搞一個好的宣言。我們黨也準備起草一個稿子，供你們考慮^⑦。11月3日晚，中蘇兩黨舉行會談，首先討論了起草文件的問題。關於會議是否要通過一個共同宣言的問題，赫魯曉夫說，各國共產黨都同意在會議上通過這樣一個文件，而且哥穆爾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簽字。關於蘇方的草稿，赫魯曉夫說，正在根據中共的意見修改，比如不要提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澤東表示，從內容上來說，原來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議由中蘇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並指定鄧小平、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參加。毛澤東還提出推遲會議召開的時間，以使宣言的修改時間更加充裕。赫魯曉夫表示同意。會談中，赫魯曉夫再次提出要辦一個指導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刊物，還提到要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毛澤東仍然表示不贊成，他說：「這樣的刊物用處不大，而且也不容易辦好，評論其他國家的情況很難，評價也不容易恰當，過去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原則上不反對成立組織。我們又考慮，暫時不搞組織，可以使一些國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國主義國家，而是指亞非國家。」毛澤東提出，還是用定期召開會議的方式交換意見，由蘇共作會議召集人。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毛澤東主張他們不在宣言上簽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對文件中的各點，十二個執政黨(不含南斯拉夫)必須執行，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兄弟黨只是作為建議提出^⑧。

中共代表團從11月3日晚上即開始修改草稿，由陸定一、胡喬木和陳伯達分頭執筆，鄧小平主持討論修改，毛澤東最後審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蘇共中央也提出了一個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蘇兩黨代表團分別由鄧小平和蘇斯洛夫領頭開始會商。討論的結果是，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團的草稿為基礎，進行修改、補充^⑨。11月8日中午，中蘇雙方代表再次會商，就宣言草案交換了意見。雙方基本取得共識，但在和平過渡的問題上，分歧依舊^⑩。關於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問題，是蘇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蘇共認為，目前國際局勢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制度和平共處，因此出現了和平過渡的新前景，其中包括兩個含義：一個是指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政權的過程，一個是指取得政權後對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這裏發生爭論的是前者。在蘇共最初

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的當天，赫魯曉夫登門拜訪。毛澤東說，我提早到來就是為了宣言草案。我們黨也準備起草一個稿子，供你們考慮。毛澤東還提出推遲會議召開的時間，使宣言的修改時間更充裕。

的宣言草案中的說法是：「由於國際舞台上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從而為各個國家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開闢了新前景。工人階級追求通過和平途徑實現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裏，共產黨員力爭通過與社會黨人結盟和爭取議會中牢固的大多數，以及深入地開展大規模的非議會的革命性階級鬥爭的途徑，把人民的絕大多數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把資產階級的議會變成真正體現人民意願的，並能夠摧毀反動勢力的抵抗和確保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具。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會給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經過修改的第二稿，在這一點上基本沒有改動^②。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須提出兩種可能性，並且應該強調武裝鬥爭的前景。

為了說服蘇共，毛澤東決定主要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工作。11月7日至9日，毛澤東分別與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 (Palmiro Togliatti)、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會談一次，與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 (Harry Pollitt) 和總書記高蘭 (John Gollan) 會談兩次。毛澤東在談話中反覆指出，在革命道路的問題上，是否堅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則，是否堅持和平過渡和革命戰爭兩種可能性，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根本區別。必須準備革命的兩手，不宜過份強調和平過渡。這幾個西歐共產黨領導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澤東的看法，認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兩種可能性。其實，西歐各黨的立場也是有區別的。法共傾向於武裝鬥爭，意共更強調議會鬥爭，多列士和陶里亞蒂為此還在莫斯科吵了起來。英共則認為，英國下一屆政府可能是工黨上台，這對和平過渡更有利。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談話中沒有過多強調武裝鬥爭的問題，而中共提出的兩種可能性的說法，則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折衷方案^③。

11月10日中蘇兩黨會商前，各自分別召開會議研究對策。赫魯曉夫主持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11月11日把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準備的大會報告分發給各兄弟共產黨代表團。關於宣言草案，委託蘇斯洛夫等人與中共代表協商，繼續完成宣言文本的制訂工作。會議特別指出，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問題，要「堅持自己的立場」^④。中共代表團認為，蘇共的主要顧慮是，如果改變對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就無法與蘇共二十大的提法銜接，這樣很難向蘇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交代。中共估計到蘇共會堅持自己的立場，為了維護團結，又堅持原則，鄧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一個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述中共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聯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毛澤東同意這個建議，指定陳伯達、胡喬木起草這份意見提綱^⑤。在蘇共中央主席團開會的同時，毛澤東主持了中共代表團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當日下午，中蘇兩黨起草宣言的小組再次會談。鄧小平首先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雙方經過磋商，終於就全部草案達成一致意見，並決定以蘇共和中共兩個代表團的名義將草案提交各國代表團討論^⑥。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宣言草案，授權代表團定稿。1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也聽取並通過了關於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見，確定由起草委員會直接與中共代表商議定稿。在此期間，中蘇兩黨代表團還商定，建議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不列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於14日召開的會議，以免增加他們國內工作的困難。經與各黨交換意見，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個社

毛澤東反覆指出，在革命道路的問題上，是否堅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則，是否堅持和平過渡和革命戰爭兩種可能性，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根本區別。必須準備革命的兩手，不宜過份強調和平過渡。

會主義國家黨代表會議之後，再召開世界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的會議。這個會議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託蘇聯和波蘭黨的代表起草^⑦。

至此，中蘇之間一個最大的分歧意見得到解決。與蘇共的草案相比，會議最後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按照中共的意見，有兩點重要修改：一、在指出和平過渡可能性的同時，還指出了非和平過渡道路，並強調「在每一個國家裏，哪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具有現實可能性，決定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二、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時，同時提出應在議會外開展廣泛的群眾鬥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要條件^⑧。至於中共的書面提綱，當時只提供給了蘇共，既沒有在大會上公開，也沒有提交給任何其他黨的代表團。直到1963年中蘇大論戰時，這個文件才公布於眾。實際上，中共《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在原則上與宣言的提法沒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兩點：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其可能性；爭取與社會黨左派和中間派建立統一戰線很重要，但不能模糊與社會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原則界限^⑨。鄧小平後來在八大二次會議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對於我們的觀點，蘇聯同志沒有表示不同意見。」^⑩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真正的分歧還有更深層的含義。

就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而言，當時中國的外交方針與蘇共的觀點，特別是經過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⑪。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宣言修改草案的當天，周恩來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作了一個報告。周說，現在世界上存在着兩個對立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形成，並且不斷強大起來，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定要衰亡下去。這是肯定的、必然的趨勢。因此，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中，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就是敢於在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通過和平競賽可以使帝國主義一天天削弱下去。我們提出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的政策，但並不怕、也不會疏忽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要警惕戰爭的危險。關於國家的過渡，有兩種基本方法，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近四五年來，國際形勢一般地說是趨於和緩的，但是並不排斥在個別問題、個別地區、個別一段時間內會有緊張^⑫。這說明，中共代表團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堅持不同意見，核心的考慮就是應該強調中國革命的主要經驗，即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蘇聯堅持和平過渡的提法，主要也是為了與蘇共二十大路線銜接。如果在共產黨國際會議上按照蘇聯提法表述這個問題，就等於確認了蘇共二十大的國際意義，說它開闢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那麼中共的革命經驗將置於何地？吳冷西的這個感受是十分準確的——這就是中蘇分歧的深層含義。中共代表團表面上爭論的是「和平過渡」的提法，實際上是不願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蘇共二十大^⑬。否則就很難理解，為甚麼宣言已經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談到「和平過渡」時提出了兩種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員會上中共代表團還是聲明：「中國黨對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見的，既然許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們就不堅持了」^⑭。當然，為了中蘇團結，毛澤東最後還是做出了妥協和讓步。但恰恰是這種求同存異的做法，為日後中蘇爭論和大論戰留下了伏筆，中共為此後悔不已^⑮。

當然，莫斯科會議上的分歧和矛盾並不只是表現在中蘇之間，不過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異」的方式處理了。如意共對「在目前條件下，主要危險是修正主

中共代表團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堅持不同意見，核心的考慮就是應該強調中國革命的主要經驗，即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蘇聯堅持和平過渡的提法，主要是為了與蘇共二十大路線銜接。

義」的說法不滿意，於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對於每一個共產黨說來，哪一種危險在某一時期是主要危險，由各個黨自己判斷。」再如，蘇共堅持還要辦一個共產黨的國際刊物，有些黨不同意，最後達成口頭協議，將來刊物辦起來，只刊登相同意見，不刊登分歧意見，不搞批評和爭論^⑥。經過毛澤東的百般努力，確實搞出了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達到了求同存異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懷疑的。實際上《莫斯科宣言》沒有任何約束力，文件雖經大家簽字，但模稜兩可的用語處處可見，既要這樣，又要那樣；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這就難怪會議之後各黨依然各行其是，而後來發生爭執時，又都援引宣言的觀點來指責對方。仔細品味可以發現，其實這一紙宣言，從內容到形式，都真實地反映了中蘇關係的性質、特點和實質，是中蘇同盟關係最典型的寫照。

註釋

① 出席這次會議的共有六十八個黨，其中四個黨（如美國共產黨）由於在國內所處的特殊環境，沒有公開亮相。（吳冷西：《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1956-196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98-99；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723。）

② 關於莫斯科會議及中共在會議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外，目前很少看到有專門的研究成果。《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設專節講述了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活動，引用了不少中國檔案，很有史料價值，但主要是毛的一些談話，其他涉及不多。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一書也有一章講莫斯科會議，但重點在分析會議中爭論的問題，而對會議籌備和進行的過程語焉不詳。

③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95；《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4。還有研究著作認為，恢復各國共產黨聯繫的倡議，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於1957年提出的（雷明頓〔Robin A. Remington〕著，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史翻譯組譯：《華沙條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頁46）。這顯然更是遠離事實的。

④ 與中國學界傳統的看法不同，筆者認為，從1954年10月開始，直到1957年底，中蘇關係一直處於最佳狀態，即蜜月期。參見〈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載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1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58。

⑤ 參見〈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世界工聯北京會議的若干問題〉等文，載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72-464。

⑥ 筆者的觀點詳見〈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頁28-70。

⑦ 詳見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頁172-87。

⑧ 斯大林的最後一次努力是計劃在1951年初再次召開情報局會議，並提議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擔任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但遭到陶里亞蒂的拒絕，設想中的會議也未能舉行。參見Г. М. Адиеков,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4 (1996): 156-61。

⑨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6年2月22日，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 3, оп. 8, д. 389, л. 67-69；А. А. Фурсенко（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 106-107, 927。

⑩⑪ 米丘諾維奇（Veljko Mićunović）著，達洲等譯：《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北京：三聯書店，1980），頁34-37；416。

- ① 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中國的局勢，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ф. 17, оп. 128, д. 1173, л. 1-37。
- ②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8)，2003)，頁188、189。
- ③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1-73, 232-33；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13-14。
- ④ 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2001年10月(下同)。
- ⑤⑦⑧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933; 933; 143, 947.
- ⑥ 《人民日報》，1956年4月19日。關於情報局解散過程的研究，詳見Л. Я. Гибианский,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4 (1993): 131-52。
- ⑨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30-34; К.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52-68. 1956年7月2日《真理報》和7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決議。
- ⑩ 《人民日報》，1956年7月31日。
- ⑪ 據不完全統計，從10月20日到12月底，毛澤東主持中共高層會議達二十六次之多，認真研究了國際局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種種問題。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頁9。
- ⑫ 詳見沈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對於劉少奇訪蘇和周恩來的穿梭外交，赫魯曉夫感到「非常滿意」，儘管他對中共的批評有些耿耿於懷。見Н. С.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361-63。
- ⑬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7。閻在寫作時不僅查閱了中央檔案館的大量材料，還核對了俄國檔案。
- ⑭ 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頁267-70。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雖然簡單，但可以證實南斯拉夫大使回憶的基本內容。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3-14。
- ⑮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10；《周恩來年譜》，中卷，頁13；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0。
- ⑯ 關於彭真的通報，當事人的回憶不盡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譯)回憶說，彭真只講了東歐的局勢已經穩定的情況，赫魯曉夫提出重新組織共產黨國際機構的問題，彭真表示會向中共中央報告。(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頁109。)閻明復(周恩來的翻譯)回憶彭真通報的內容是：「鐵托當時表示同意召開這樣的會議，但是要求不規定議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但無論如何，根據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記錄，莫斯科當時從彭真那裏得知的情況是：「鐵托原則上同意參加擬定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見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99, л. 26;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991。
- ⑰ 中國外交部報告：波匈事件之後，中國在蘇聯對外關係中的地位顯得更加突出，蘇聯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蘇友好關係的新做法」。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91-01，頁2-7。
- ⑱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7年2月2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7, л. 1-8;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224, 990-91。
- ⑲ 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0。筆者在中國外交部新解密的檔案中，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彭真與鐵托會晤的文件，可見此事極為隱秘。
- ⑳㉑㉒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7；10-11。
- ㉓ В. П. Наумов,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2 (1996): 10-31; Р. Г. 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властн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6 (1995): 3-14。有關檔案文獻見：Ковалева Н. и т. д. сост.,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1998)。中譯本見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③③ А. 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 66-67; “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 (1957)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Арх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no. 1 (2000): 10-20;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號，頁32-33。《內部參考》，1949年創刊，1964年停刊。當時只供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現已成為史料，在一些海外圖書館即可看到，筆者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查閱到相關資料。

③④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38-01，頁1-9；109-01124-08，頁91-94。

③⑤ 上海市檔案館，A77-2-404，頁1-3；《內部參考》，1957年7月4日，第2248號，頁15-18；7月5日，第2249號，頁5-6；7月8日，第2251號，頁76-86。

③⑥③⑥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49-51；49。

③⑦ 據中國大使劉曉回憶，自蘇共二十大以後，蘇共黨內兩派都頻繁與中國使館接觸，尋求中國黨的理解和支持。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50-51。

③⑧ 閻明復：〈代序〉，載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頁1-2。

③⑩ 《人民日報》，1957年7月7日。

③⑪ 《內部參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號，頁32。

③⑫ 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192。

③⑬ 1957年7月5日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

③⑭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7年7月8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7, л. 59-59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259。

③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05。

③⑯ АПРФ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 ф. 3, оп. 23, д. 63, л. 64-71;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1018。

③⑰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7年10月18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18-19;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274, 1018。

③⑱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09；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2。

③⑲ 1956年蘇聯曾兩次邀請毛澤東訪蘇，均遭拒絕。1957年5月伏羅希洛夫訪華時再次提出邀請，毛澤東表示還要研究後再答覆。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1-12。

③⑳⑳ 《周恩來年譜》，中卷，頁84；95-96。

③㉑ 周恩來與尤金談話記錄，1957年10月2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87-18，頁79。

③㉒ 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3；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8；《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4。閻原來回憶說，蘇共草案是10月25日交給中共的，後來的回憶又改為28日。見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3。

③㉓ 尤金致蘇共中央電，1957年10月30日。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複印件匯編》，第12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2004)，頁2863-68。另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4-27；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9。

③㉔ 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6。楊尚昆回憶說，中方的修改稿當時就譯成俄文交給蘇方了。(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頁3。)這大概是記憶有誤，詳見下文。

③㉕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7年11月2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6-27;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279-80, 1021-22。

- ⑤7 1957年11月6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
- ⑤8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97-98。
- ⑤9 《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8、733；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20-22。
- ⑥0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97-99。
- ⑥1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89；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
- ⑥2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1022；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58-60；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97-98。
- ⑥3 《毛澤東傳(1949-1976)》，頁733-34；1957年11月8日毛澤東與多列士談話，與波立特、高蘭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06-107、133-34。
- ⑥4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7年11月10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8-28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280-81。
- ⑥5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290。
- ⑥6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1；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7年11月12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9；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 281, 1022。
- ⑥8 《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2日。
- ⑥9 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96-99。
- ⑦0 鄧小平：《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1958年5月5日，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號59，第78-84張。
- ⑦1 講到具體問題時，毛澤東並不否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如在與陶里亞蒂談話時毛澤東就說，意大利資產階級比較弱，所以將來意大利有可能先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第一階段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到第二階段才是無產階級專政。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11-12。
- ⑦3 為此，中共甚至反對蘇方草案的如下提法：「蘇共二十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中共八大、法共和意共的代表大會也表示出對馬列主義的忠誠」。中方表示在宣言中無需提到中共八大，各黨代表大會是各黨自己的事，不需要國際會議批准。見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32。
- ⑦4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39-40。看起來，中共不得不同意的那段文字應該是指宣言中的蘇共二十大「開闢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這句話。(見《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2日。)後來，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會議期間，中蘇之間爭論最大的還是在會議宣言中要不要提蘇共二十大的問題。參見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610-11。
- ⑦5 李丹慧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考察，並撰寫了長篇論文〈最後的努力：中蘇在1960年的鬥爭與調和〉，《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以此反觀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很有啟發。
- ⑦6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35、149-50。1958年1月31日蘇共中央來信徵求中共對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刊物的意見，蘇共建議這個雜誌可作為各黨聯合刊物，只進行宣傳和研究馬列主義，交流各黨經驗。2月27日中共回信表示贊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8.1-1958.12》，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97-98)。《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於1958-1991年期間，在布拉格用34種語言出版，並在145個國家發行。

沈志華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冷戰國際史專家，代表作包括《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蘇聯專家在中國》、《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